

蒙古国南戈壁省西夏 长城与汉受降城有关问题的再探讨

A·A·科瓦列夫
(俄罗斯圣彼得堡大学)

Д·额尔德涅巴特尔
(蒙古国乌兰巴托大学)

2005年和2007年,由俄罗斯圣彼得堡大学和蒙古国乌兰巴托大学组成的中亚国际考古团在A·A·科瓦列夫和Д·额尔德涅巴特尔的领导下对蒙古国南戈壁省的“成吉思汗边墙”进行了实地调查。这段长城在俄罗斯和蒙古国地图上有精确的标注,比例尺为1:500000和1:100000。在蒙古国地理学家T·巴森院士^①的著作中可以找到对这段长城位置的详细描述和地图资料。可以断定,这段长城西起北纬 $42^{\circ}10.411'$,东经 $102^{\circ}24.851'$,在阿拉嘎乌拉山以北(中蒙边境线由此山通过),向东沿边境线途径诺言县、巴彦达赖县、和尔门县延伸至西沃哈塔布齐,在北纬 $42^{\circ}09'$,东经 $102^{\circ}57'$ 处拐向东北方向,经郝日木温都尔山,一直向东北延展至乌兰德勒山(北纬 $42^{\circ}29'$,东经 $103^{\circ}56'$),从这里拐向东,进入瑙木冈县境内,沿宝日德中格戈壁荒漠南线向东南东延伸,在北纬 $42^{\circ}11'$,东经 $105^{\circ}42'$ 拐向东南,进入塔林沙日嘎敖包(站点)的中国境内(北纬 $41^{\circ}59.133'$,东经 $105^{\circ}52.559'$)。据T·巴森计算,蒙古国内的城墙长度不少于315公里,但遗憾的是,在我们之前除了1957年X·普列列院士在瑙木冈县查看

过这段长城外,蒙古国再没有一位考古人员对这段长城做过调查^②。

我们要讨论的问题是:蒙古国境内的成吉思汗边墙与中国内蒙古自治区境内的长城有何关系。对于这个问题在中国存在两种观点。众所周知,内蒙古发现了两段平行的长城断壁,这两段断壁伸向蒙古国边境线,被认为是汉代“外长城”的北线和南线,它们穿过内蒙古自治区巴彦淖尔市的乌拉特后旗、乌拉特中旗和包头市的达尔汗茂明安联合旗。1977年唐晓峰先生发表的一篇文章指出,北线继续延伸进入蒙古国境内成为“成吉思汗边墙”,而南线在中蒙边境处中断^③。在郑绍宗先生1980年发表的文章^④和欧燕先生1987年发表的文章中^⑤,对这段长城也有这样的描述。但1980年盖山林先生和陆思贤先生却在文章中根据“当地牧民的说法”认定,北线越过中蒙边境线进入蒙古国境内向北或西北延伸至阿尔泰山。同时,南线也进入蒙古国境内,继续向西延伸,和居延塞外的长城连接起来,也就是说,我们研究的“成吉思汗征边墙”就是南线的延伸部分^⑥。在长城国际学术研讨会论文集里也能

见到这样的观点^⑦。2001年李逸友先生在一篇总结性的文章中提到,南线进入蒙古国境内,向西延伸至嘎顺怒淖尔,而北线好象是由中蒙边境向北伸展,在瑙木冈县城的阿尔泰山附近中断^⑧,在内蒙古文物地图册中我们也看见了相同的标注^⑨。

事实上我们认为上述诸位的观点都是错误的。南线根本没有进入蒙古国境内,而北线也并非由中蒙边境向北延伸,而是向西延伸。我们通过研究“Google Earth”网上中蒙边境的卫星照片,判断其结论恰好与中国学者的观点不相符合。蒙古国境内的“成吉思汗边墙”在北纬 $41^{\circ}59.133'$ 、东经 $105^{\circ}52.559'$ 处横穿中国边境线,是北线的延伸部分,而南线根本没有进入蒙古国境内,南线的最西端位于中国境内,在朝鲁库伦城址西北方7公里远处(北纬 $41^{\circ}44.021'$ 、东经 $105^{\circ}59.574'$)^⑩。

我们对“成吉思汗边墙”(北线)的两个地段做了直接调查。2005年我们调查的是巴彦达赖县和和尔门县境内的长城,即北纬 $42^{\circ}11'$ 、东经 $102^{\circ}45'$ 到北纬 $42^{\circ}14.3'$ 、东经 $103^{\circ}17.8'$ 之间的长城。这段长城,如中国的研究者所指出的一样,建造在山脉上的部分,由石头构成。而平原上的大部分由梭梭(Haloxylon ammodendron)构成——梭梭层夹杂着土层。在北纬 $42^{\circ}11'$ 、东经 $102^{\circ}45'$ 的区域内石砌的城墙高达3米,而北纬 $42^{\circ}12'$ 、东经 $103^{\circ}08'$ 的区域内梭梭和土质的城墙高度超过2.5米。其余地区城墙高度不超过1米,宽为3米左右,两侧均有宽为3米的浅壕沟。

2005年我们调查了巴彦达赖县和和尔门县境内的三处土城墙的城址。

郝日木温都尔城址(北纬 $42^{\circ}09.066'$ 、东经 $103^{\circ}0.714'$ 、巴彦达赖县),位于长城以南2.5公里处,北偏西 15° ,每侧城墙长约95米,厚度约6米,高度约1.5米。城墙每个角上都有高约2.5米的角台,东南墙的中间有宽约7米的门洞,城墙外面围绕着一条约1米深,5米宽的壕,城墙上垂直插着直径平均为2厘米的红杨木橛,其根部保存完好,可见这样做是为了防御敌人的骑兵部队。这些红杨木橛一部分已做过碳14分析,城堡里还发现了两根直径约为15厘米插入地下深约为0.7米的有尖端的红杨木桩的根部。对这两根木桩进行清洗后,也做了碳14分析,木桩与敦煌市3号烽燧照片上看到的一模一样^⑪。我们在城址里挖了 5×5 米的探沟,但没有发现文化层。

百兴图城址(北纬 $42^{\circ}11.504'$ 、东经 $103^{\circ}8.515'$ 、和尔门县),位于长城以南1公里处,偏西 10° ,南北方向城墙长约100米,东西方向约87米,城墙厚度约6米,高度约1.5米,每个角的角台高达2米。东墙中间留有宽约6米的门洞。城墙外围有宽约7米,深达1米的壕沟,我们在城址里挖了三处 1×1 米的探沟,没有发现文化层。

哈拉西沃城址(北纬 $42^{\circ}11.504'$ 、东经 $103^{\circ}8.515'$ 和尔门县),位于长城以南120米处,偏西 10° ,南北方向城墙长约110米,东西方向约96米,城墙厚度约7米,高度约1.5米,四角的角台高达2.5米。东墙中间留有宽约10米的门洞。城墙外围有宽约6米,深达1米的壕沟,我们在城址里挖了两处 1×1 米的探沟,没有发现文化层。

我们还调查了另外两处城址。

巴彦达赖县的亦和浩特格爾城址(北纬

42°11.427', 东经 102°39.249'), 位于长城以南 60 米处, 长城在此拐弯。偏西约 30°, 北城墙长约 76 米, 南城墙约 86 米, 东西方向城墙约 72 米。墙厚约 5 米, 角台直径约 9 米, 东墙中间留有宽约 5 米的门洞, 城外有宽约 4.5 米的壕沟。

诺彦县的阿拉嘎城址(北纬 42°10.336', 东经 102°25.043'), 位于长城以南 90 米处, 长城在此终止。西北方向城墙长约 78 米, 东南方向城墙约 87 米, 东西方向城墙均约 90 米。墙厚约 5 米, 角台直径约 9 米, 东南方向墙中间留有宽约 6 米的门洞, 城外有宽约 5 米的壕沟。

以上这五个城址和长城一起构成了一套完整的防御体系。我们考古队在 2005 年发现的亭障址和烽火台就是这个系统的重要组成部分。

亭障遗址(北纬 42°10.053', 东经 102°47.199' 巴彦达赖县), 位于长城以南 100 米处的山脉上, 海拔 295 米, 比周围地势至少高 30 米。平面呈圆形, 直径约 5 米, 城墙由石块和梭梭建成, 高约 3 米, 从亭障址可以很清晰地看见烽燧(北纬 42°10.312', 东经 102°50.079' 巴彦达赖县), 烽燧坐落于长城以北 1 公里处, 海拔 1337 米, 烽燧石砌, 直径约 4 米, 高约 3 米。

石筑结构的亭障址(北纬 42°11.640', 东经 102°58.453' 巴彦达赖县), 护卫着长城以北 3 公里处的西沃哈塔布齐山道, 平面略呈椭圆形, 长 25 米, 宽 16 米,。城墙高约 4 米, 外壁呈漫坡状, 内壁呈垂直形, 西城墙有一条宽 1.5 米的登道。我们在城址里挖掘了 6 处 1×1 米的探沟, 在登道旁发现了木结构残片, 我们对这些残片进行了碳 14 分析。

长城蜿蜒通过郝日木温都尔山的山顶, 从这里可以清楚地看到石筑结构的亭障址西沃哈塔布齐。在山顶(北纬 42°10.63', 东经 103°1.8' 巴彦达赖县)1310 米高度处还有两个小的石筑结构亭障址, 从位于山南侧 2.5 公里处的郝日木温都尔城址可以清楚地看见这些亭障址。

长城以北 400 米处的百兴图札答盖(北纬 42°11.768', 东经 103°6.295' 和尔门县)1314 米高的山顶上发现了瞭望亭障址。它是一块约 4×3 米的场地, 北面有石头和梭梭砌成的围墙, 南面用岩石包围了起来, 百兴图城址位于这座山南 1.5 公里处。

还有一处瞭望亭障址位于山道上方, 该山道通往查干乌拉山以东的现在的中国境内。该亭障址(北纬 42°1.140', 东经 103°15.992' 和尔门县)建在 1311 米高的地方, 呈椭圆形, 沿西北走向东南, 长 13.6 米宽 7.4 米, 城墙高达 3 米。

2007 年我们还调查了瑙木冈县境内的长城, 该段长城位于即北纬 42°29.478', 东经 104°15.135' 到北纬 42°15.116', 东经 104°16.720' 之间。长城高约 1 米, 宽达 3 米, 两侧都有宽达 2 米、深达 1 米的城壕。城墙基本上是土质结构, 有些地方可见一些用来加固的梭梭。

在实地考察中我们又发现了两处与上述城址类似的土筑的城址。

赫日门查干敖包城址(北纬 42°26.292', 东经 104°39.897'), 位于长城以南 1 公里处, 该城向东偏转 15°。东西城墙长约 115 米, 南北城墙长约 145 米, 城墙厚度约 4 米, 高约 1 米, 角台直径 8 米, 高约 2 米。东墙中部有宽约 5 米的门洞。城墙外有宽约 3 米, 深约 1

米的城壕，我们在城址里挖了两处探沟，没有发现文化层。

甘查毛顿胡图克城址(北纬 42°13.310'，东经 105°19.915')，位于长城以南 2.5 公里处的一个同名的井旁，西北城墙长约 111 米，东南城墙长约 117 米，东北和西南城墙均长约 135 米，城墙高度约 1 米，厚度约 5 米，角台直径 8 米，高约 2 米。东墙中间留有宽约 4 米的门洞。城墙外有宽约 4 米，深约 1 米的城壕，我们在城址里挖了两处探沟，没有发现文化层。

为了对上述各障城遗址进行确切的年代分析，俄罗斯科学院文物研究所(圣彼得堡)碳 14 实验室对从各遗址内采集的木质

样品进行了碳 14 分析。

测定的日期明显可分为两组：第一组(早期)是来自土壤(Le-7515, Le-7985, Le-7986)或长城下层(Le-7984)的样品日期，这些样品的日期都是公元 10 到 13 世纪末；第二组(公元 14 世纪)是来自长城上层(Le-7980, Le-7981, Le-7982, Le-7983)的梭梭样品的日期，这些样品由于多年处在露天环境中，因此受到很多外部因素的影响，显然，用被研究植物——梭梭生命周期位 50 年来解释两组之间差异是不合适的，正确的结果应取自保存条件良好的第一组样品。

实验得到的 8 个时间段可以证明，“成吉思汗边墙”(北线)及其相关建筑不可能建

遗址	实验编号	注有日期的材料	14-C 年龄 BP	年龄校正区间 (68.2%) 公元	年龄校正区间 (95.4%) 公元
赫日木温都尔城址，城内木撅	Le-7515	红杨	1135±20	890-905 915-960	880-990
赫日木温都尔城址，城墙浮式排泥管	Le-7985	红杨	780±30	1220-1270	1210-1285
西沃哈塔布齐亭障址，探沟，3 锹	Le-7986	木	820±30	1185-1265	1050-1080 1150-1280
长城，西沃哈塔布齐亭障址以西 4 公里处，下层	Le-7984	梭梭	770±16	1225-1235 1240-1275	1220-1275
百兴图城址附近长城	Le-7982	梭梭	690±16	1275-1295	1270-1300 1360-1390
百兴图城址附近长城	Le-7983	梭梭	610±20	1300-1325 1340-1365 1380-1400	1290-1400
哈拉西沃城址附近的长城	Le-7980	梭梭	620±25	1295-1325 1345-1370 1375-1395	1290-1400
哈拉西沃城址附近的长城	Le-7981	梭梭	605±25	1305-1330 1335-1365 1380-1400	1290-1410

成于汉朝时期,所有认为内蒙古境内的“北线”是“光禄塞”¹²的研究结论都是错误的,只有没到达蒙古国边境的“南线”属于汉朝时期,既然“南线”才是“光禄寨”,那么“南线”终止的地方(在朝鲁库伦城址以西几公里处)就是《史记·匈奴列传》中记载的汉使徐自为“筑城鄯列亭至庐胸”中的“庐胸”,大概“庐胸”就是南戈壁省南部的山脉或包日红戈壁荒漠之意。

X.普尔列认为“成吉思汗边墙”是王汗建造的加固部分,T.巴森认为它是窝阔台的建筑¹³,这同样也是不对的。上述研究结果表明:整个这条加固的障塞是为了防御来自北方敌对势力进攻的,因为长城以南有用于驻军的城,而亭障和烽火台都是用来监视北方敌情。因此,掌握着长城以北土地的王汗不可能建造这条障塞,而他在位期间这里还根本没有边境线,也不需建造防线。

综上所述,我们的初步判断是:这段长城是西夏国为了抵御蒙古人于13世纪初建造的,第一组碳14分析样品可以证明这个推断。另外第二组样品,又给出了一个附证的时间,即14世纪,明代早期。那么,这段长城有可能是14世纪下半叶由明朝修建的吗?我们也认为这是不可能的,当时明朝政府还没有监管到这片土地,因此不可能修建长达800多公里的长城。明朝军队几次打到蒙古国境内,向蒙古骑兵和戍卫部队发起进攻,但始终没有占据这里。有以下史料可以证明。

洪武五年(1372年),冯胜至亦集乃路,守将卜颜帖木尔亦降。次别笃山,岐王朵尔只班遁去,追获其平章长加奴等二十七人及骆驼牛羊十余万。见《明史》卷129。

洪武十三年(1380年),命[沐]英总陕西兵出塞,略亦集乃路,渡黄河,登贺兰山,涉流沙,七日至其境。分四翼夜击之,而自以骁骑冲其中坚。擒脱火赤及知院爱足等,获其全部以归。见《明史》卷126。

正统二年(1436年)冬,命都督任礼为总兵官,蒋贵、赵安副之,尚书王骥督师,以便宜行事。明年夏,复败朵尔只伯等于石城。阿台与朵尔合,复败之兀鲁乃地,追及黑泉,又及之刁沟,出沙漠千里,东西来击,敌几尽,先后获其部长一百五十人。于是阿台、朵尔只伯等来击。见《明史》卷327。

正统三年(1437年)春,偕诸将出塞,以贵为前锋,而自与任礼帅大军后继,与贵约曰:「不捷,无相见也。」贵击敌石城,敌走兀鲁乃。贵帅轻骑二千五百人出镇夷,间道兼行,三日夜及之。擒左丞脱罗,斩首三百余,获金银印各一,驼马兵甲千计。骥与礼自梧桐林至亦集乃,擒枢密、同知、金院十五人,万户二人。降其部落,穷进至黑泉。而赵安等出昌宁,至刁力沟,亦擒右丞、达鲁花赤三十人。分道来击,转战千余里,朵尔只伯远遁。论功,贵、礼皆封伯,而骥兼大理卿,支二俸。寻召部还,理部事。见《明史》卷171。

正统三年(1437年),蒋贵镇守陕西都御史陈镒言状,尚书王骥出理边务,斩敬,贵立功。贵感奋,会朵尔只伯惧罪,连遣使入贡,敌势稍弱。贵帅轻骑败之于狼山,追抵石城。已,闻朵尔只伯依阿台于兀鲁乃地,贵将二千五百人为前锋往袭。副将李安沮之,贵拔剑厉声叱安曰:「敢阻车者死!」遂出镇夷。间道疾驰三日夜,抵其巢。阿台方牧马,贵猝入马群,令士卒以鞭击弓鞮惊马,马尽佚。敌失马,挽弓步斗。贵纵蹂击,指挥毛哈阿奋入

其阵,大败之。复分军为两翼,别遣百骑乘高为疑兵,转战八十里。会任礼亦追敌至黑泉,阿台与朵尔只伯以数骑远遁,西边悉平。见《明史》卷 155。

正统三年,任礼与王骥、蒋贵出塞,败朵尔只伯于石城。复分道至梧桐林、亦集乃,进至黑泉而还。见《明史》卷 155。

正统三年,赵安复与王骥、任礼、蒋贵分道进师,至刁力沟执右丞、达鲁花赤等三十人。见《明史》卷 155。

根据上述史料,明朝军队出征时的线路是出甘肃、陕西,经阿拉善盟进入今蒙古国南戈壁省后返回。因此,明朝在戈壁沙漠中没有任何巩固的地位,也不可能在那里建成加固工事。根据这段历史,从长城上层的梭梭样品得来的第二组碳 14 确定的日期是不可取的,因为做实验的植物处在露天环境中,受到来自各方面因素的影响,所以实验得到的日期是错误的。

而第一组碳 14 确定的日期 10—13 世纪是正确的。加固障塞的是所以,也就是唐古特人,西夏国建造,更确切的说,是在 13 世纪初,作为防御蒙古人进攻而建的屏障。

西夏国的势力范围在今天的阿拉善盟和巴彦淖尔盟一带,1035 年在这片土地上建立了黑水镇燕监军司(今额济纳旗),白马强镇监军司(今阿拉善右旗,左旗),黑山威福监军司(今乌拉特中旗,后旗),弥娥州监军司(今乌拉特后旗)^⑩。据《史记》卷 60《地理志三》记载,“黑山”就是今天的甘肃张掖县北“龙首山”,因此有的学者认为,黑山威福监军司就位于这个地方,在嘎顺怒淖尔^⑪的正南方。但这种观点是错误的,黑山威福监军司的行政中心是兀刺海(斡罗孩)。根据《元

史》卷 60《地理志三》的记载,“太祖四年(1209 年),由黑水城北兀刺海西关口入河西”,因此,兀刺海(斡罗孩)位于嘎顺怒淖尔以东,而不是以南。更确切的说,黑山,即黑山威福监军司的行政中心所在地是今河套地区乌拉山和大青山一带。对于黑山、黑水监军司的地理位置鲍桐先生认为,兀刺海城是今乌拉特中旗新忽热乡所在地北 2 公里处的一古城。城内文物极少,巴彦淖尔盟文物部门普查中认定为金元时期古城^⑫。据调查结果来看,古城东西约 850 米,南北约 800 米,在规模上和著名的元代路一级的城市相符:应昌路古城(650x800 米),德宁路古城(960x574 米)^⑬。《元史》卷 93《志第四十二》《食货一》云:“中统八年,又定西夏中与路、西宁州、兀刺海三处之税,其数与前僧道同”。因此,元兀刺海路位于“西夏中”,它的中心可能就在西夏兀刺海(斡罗孩)城。所以,新忽热古城可能就是建在西夏元兀刺海(斡罗孩)城的元兀刺海路的中心。一些书面资料也可以说明^⑭新忽热古城的位置正好就在西夏兀刺海(斡罗孩)城:它位于山北,保护着通往黄河的道路,同时防御来自北方(蒙古)、长城以外和东北方(金国)的进攻;唐古特语 Oui-ra-ca(兀刺海)的意思是“长城上的通道”^⑮。但这里的长城并没有修完,只能在断壁上看出它的正常高度,附近的城址也没有利用起来。

任何关于唐古特人治北部边界建造长城的文献资料都没有保存下来。但必须注意的是,《元史》卷 60《地理志三》载:“太祖四年(1209 年),由黑水城北兀刺海西关口入河西”。这里是说,蒙古人经过“关口”攻入了西夏国。这条关口位于黑水城北,兀刺海西,

正好在已加固的北线区域内。这就是说,《元史》中记载西夏国在戈壁沙漠的北部边境已得到加强。

除此之外,我们在北线附近的地方的防御工事内发现了唐古特人遗留下的遗物,走过的痕迹。在以下遗址里采集有西夏黑釉瓷缸,黄釉瓷碗残片,可以证明我们的观点。

他们是乌拉特中旗阿日呼都格城址²⁴,乌拉特后旗²⁵乌兰呼舒城址,查干额日城址,乌盖城址,红旗城址,哈日乌苏城址。阿拉善右旗(笋布尔日苏木)²⁶塔兰拜兴障址,乌兰拜兴障址,乌海希勃障址。塔兰拜兴障址、乌兰拜兴障址内有可到达城墙的登道,象我们研究的西沃哈塔布齐亭障址一样,这些加固工事是我们在南戈壁省发现的西沃哈塔布齐和查干乌拉山亭障址向南延伸的部分,是西夏国在13世纪初建造的,而不是在汉朝时期。

西夏国建立北线防御体系的结论又引出了甘肃酒泉西境内汉代长城的定性问题。这段长城是用芦苇(红杨木)和土混合建造的²⁷——这正像蒙古国南戈壁省巴彦达赖县和和尔门县的长城是用梭梭和土混合建成一样。如果南戈壁省的长城属于西夏时期,那么酒泉西“红杨长城”是否也是西夏国建造的呢?然而,《史记》、《汉书》中都没有关于河西酒泉西在汉朝时建造长城的记载,只有建亭、亭障的记载²⁸。我们再来看这段长城,河西酒泉西的烽燧按建造方式来划分,明显分为两种:一是用砖坯建造的烽燧,二是用红杨混合建造的烽燧²⁹。这两种烽燧处在同一条线上,但杂乱无章。为什么同一条线上的加固工事使用了两种不同的建造技术呢?这有可能意味着带红杨层的加固工事

是西夏国建造的,一些汉代的工事可能被西夏国利用或修缮。比如,前边已提到的敦煌市3号烽燧,在那发现了与赫日温都尔城址里类似的杨木橛³⁰。11-13世纪的西夏领土西至玉门关包括甘肃一带,而甘肃西部坐落着西夏国的沙州、瓜州、肃州³¹,因此,西夏国可能是为了保护这些地方建造了“红杨”加固塞。

要回答这些问题,必须对甘肃酒泉西塞出土的红杨进行碳14分析。

我们在南隔壁省做调查期间查看了蒙古国境内的瑙木冈县内的巴音拉格城址。这个城址位于北纬42°36',东经105°10.5'。以前蒙古考古学家X.普尔列(1957年)、Д.那旺(1976年)、3.巴图赛罕(1990年)³²也曾考查过巴音布格拉城址,并进行过发掘。巴音布拉格城址位于瑙木冈县中心地区以南30公里处,在戈壁阿尔泰山胡日哈山岭以南,在宝日德中格戈壁沙漠的北边缘地带处,这里有几处水量充足的泉水(蒙古语——布拉格),每眼泉每小时出水量约2500升,今天这里成为农业发展的宝地,当地居民在这里到处种满了蔬菜。城址为土质结构的城墙,高约2米,宽约5米,城外有深约1米,宽约5米的城壕。城址现存部分只剩下北面的部分,北城墙保存完好,长110米,东墙离北墙65米远,在东南方向上,西墙残存13米。城址南部很可能是由于受到侵蚀而被毁坏,因为离现存城墙几米远处有一块2-3米高的断壁,南面的土层较其它更低一些。在X.普尔列的文章中描述该城址时提到过南面的部分³³。蒙古考古学家在城墙内进行了发掘,但没有任何发现,没有找到文化层³⁴。因此可以认为,城址是用来作为战争防御工

事的，里面不能长期居住。城址以东 60—70 米处有一连串由北至南的土丘，共有四个。南面的土丘直径 20 米，高约 1.5 米，后两个直径约 10 米，高约 1 米，北面的最大，直径约 40 米，高约 2.5 米。我们在这个土丘的顶端挖了一个 1×1 米的探沟，深 1.5 米，没有发现任何遗迹或文化层，土丘下的土是一样的，这些土丘可能是墓葬，当地居民经常在雨后发现这些墓葬散落有人骨。除了附近的壕里有人骨。除了这四个土丘外，在这附近还有一些坑墓葬。城址东北 200 米处有一高约 1.5 米、宽约 5 米长约 30 米的角台，呈东西走向，我们在这里挖了几处探沟，发现在 1 米左右深处有压实的粘土层，在上发现一些陶瓷、青铜、生铁制品的碎片，说明很可能在这个地方曾经有过供人居住的建筑物。另外这里的土壤表层及其以南地区和断壁下方 200×300 米的地域内都出土了大量的文物，这些文物很可能来自被侵蚀的文化层。探沟和土壤表层出土的文物证明，西汉时期的中原民族曾来过这里，或更确切地说，是军营曾在这里驻扎过。这里的文物与最近的汉代城址——朝鲁库伦城址^⑩出土的文物类似。我们收集到几百个泥质灰陶的残片与瓦片、30 个三棱铁铤铜镞、2 个铜带钩、2 个铜弩机、3 个盖弓帽、2 个“五铢”钱、5 个铁直口锤等文物。这些东西以前在这里也曾发现过^⑪。

X. 普尔列认为巴音布拉格城址是匈奴城，3. 巴图赛罕指出，在这里发现的陶片和金属物件汉式文物，但 3. 巴图赛罕认为，这是匈奴赵信城，汉朝的士兵曾在这里服役，但他也隶属于匈奴单于^⑫，我们认为这是完全不可能的，因为没有在这个城址找到任何匈奴文化器。

实际上这可能就是汉受降城。太初元年（公元前 104）“遣因杆将军公孙敖筑塞外受降城”（《汉书》卷 1《武帝纪》）。这发生在光禄塞（公元前 102）建成之前，更确切的说受降城位于光禄塞外，朔方郡的西北。《中国历史地图集》第二册，标注受降城在汉五原以北，光禄塞内^⑬。鲍桐先生指出，这是错误的^⑭。太初二年（公元前 102）“汉使浞野侯破奴将二万余骑出朔方西北二千余里，期至浚稽山而还。浞野侯既至期而还，左大都尉欲发而觉，单于诛之，发左方兵击浞野。浞野侯行捕首虏得数千人。还，未至受降城四百里，匈奴兵八万骑围之”（《史记》卷 110《匈奴列传》）。鲍桐先生很确信的说，因此受降城在朔方高阙西北。始元六年（公元前 81）“复遣九千骑屯受降城以备汉，北桥余吾，令可度，以备奔走”（《汉书》卷 94 上《匈奴传上》）。鲍桐先生肯定受降城在光禄塞外。否则匈奴不可能在此驻扎军队。有关本始三年（公元前 71 年）出征匈奴的描述也证明受降城在鸡鹿塞西北：“遣御史大夫田广明为祁连将军，四万余骑，出西河”（《汉书》卷 94 上《匈奴传上》）。《汉书》卷 90《酷吏传》云：“田广明出塞至受降城”。“西河郡千章，增山，有道西出眩雷塞，北部都尉治”。（《汉书》卷 28 上“地理志上”）。田广明出西河，更确切地说，是沿着这条路往西；这条路穿过在鸡鹿塞南。田广明没有穿过北河，因为有另外一支军队向北方开进：“云中太守田顺为虎牙将军，三万余骑，出五原”（《汉书》卷 94 上《匈奴传上》）。

南北朝时期在戈壁沙漠的北边由一座受降城（比干城）在北魏境内。太平真君八年（447 年）后“淮南王拜使持节、前锋大将军、都督诸军事，北讨蠕蠕，破之，运军储于比干

城”(《魏书》卷 18)。这些事件在《魏书》卷 5 中也有提及:“[太平真君九年(448 年)]十有二月,诏成周公万度归自焉耆西讨龟兹。皇太子朝于行宫,遂从北讨。至于受降城,不见蠕蠕,因积粮城内,留守而还。”《中国历史地图集》第四册也显示,比干城位于南床山下,是南戈壁省瑙木冈县的汉受降城^⑨。

汉受降城的位置后来被人们遗忘了,作者没有提及任何唐—元时期的汉受降城。所以,只有通过巴音布拉格坟墓的考古发掘来证明我们的假设—汉受降城也就是巴音布拉格城址。

《汉书》卷 90“酷吏传”云:“本始三年(公元前 71 年)田广明出塞至受降城。受降都尉前死,丧柩在堂,广明召其寡妻与奸。”由此可以推断,前述四个土丘墓葬,其中的一个应该属于受降都尉,他死于本始三年(公元前 71 年)。这是我们发现的四个坟墓当中最大的坟墓直径达 40 米左右。

通过上述论证,我们的结论是:

第一,蒙古国“成吉思汗征长城”是“外长城”北线的延伸部分。这段长城长约 800 公里,由西夏国建造,更确切的年代是 13 世纪初。“外长城”北线不是“光禄塞”。

第二,“外长城”南线是“光禄塞”。它在朝鲁库伦城址以西 7 公里处终止。这里就是汉代“庐胸”。

第三,古国南戈壁省瑙木冈县巴音布拉格城址是汉代的受降城。

注 释

T.巴森:《什么是成吉思汗墙?》乌兰巴托.2006 年第 32 页,图 22

X.普列列:《南隔壁、前杭爱等省隔壁草原地区进

行的考古调查(1962 年)》,《X.普列列院士学术论文集》T. I., 乌兰巴托,2001 年,270-280 页。第 273 页。

唐晓峰:《内蒙古西北部秦汉长城调查记》,《文物》,1977 年 5 期。16-22 页、第 18-21 页,图 5。

郑绍宗:《河北省战国、秦、汉时期古长城和城障遗址》,《中国长城遗迹调查报告集》,文物出版社。

1981 年。34-39 页。图 2。

欧燕:《我国早期的长城》,《北方文物》,1987 年 2 期,12-18 页、第 13 页,地图。

盖山林、陆思贤:《内蒙古境内战国秦汉长城遗迹》,《内蒙古文物资料续辑》,1984 年。90-100 页。第 96-97 页。

A. 张菜芳、王川:《西汉长城的修缮及其意义》,《长城国际学术研讨会论文集》。吉林大学出版社,1995 年。105-115 页。第 107 页。

B. 赵化成:《中国早期长城的考古调查与研究》,《长城国际学术研讨会论文集》,吉林大学出版社,1995 年。238-249 页,第 246-247 页。

李逸友:《中国北方长城考述》,《内蒙古文物考古》,2001 年 1 期,1-51 页。第 23-26 页。图 2。

《中国文物地图集。内蒙古自治区分册》,西安地图出版社。2003 年。上:第 268-269 页。下:第 619 页。

盖山林、陆思贤:《潮格旗朝鲁库伦汉代石城及其附近的长城》,《中国长城遗迹调查报告集》。北京。1981 年。25-33 页。

①②③《疏勒河流汉长城考察报告》,岳邦湖、钟圣祖著;甘肃省文物局编,文物出版社。2001 年。图板 11。

④同 一。

⑤T.巴森:《什么是成吉思汗墙?》乌兰巴托.2006 年第 39-43 页,图 22

⑥A:《宋史》卷 486《夏国传》

B: 李昌宪:《西夏疆域与政区考述》,《历史地理》,第一九辑。2003 年。89-11 页。第 109-110 页。

⑦A. 王北辰:《成吉思汗征伐西夏地理考》,《王北辰西北历史地理论文集》,学苑出版社,2000 年。

- 384-390页。第386页。
- B. 史为乐主编:《中国历史地名大辞典》,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5年。第2554页。
- ⑩⑬鲍桐:《兀刺海城地望和成吉思汗征西夏军事地理析》,《宁夏社会科学》,1994年6期。63-70页。
- ⑪李逸友:《内蒙古元代城址概况》,《内蒙古文物考古》,第4期,1986年。87-107页,第106页。
- ⑫同⑮A.第386页。
- ⑬《中国文物地图集。内蒙古自治区分册》,西安地图出版社。2003年,下:第626页。
- ⑭《中国文物地图集。内蒙古自治区分册》,西安地图出版社。2003年,下:第618-619页。
- ⑮《中国文物地图集。内蒙古自治区分册》,西安地图出版社。2003年,下:第634页。
- ⑯ A. 岳邦湖,钟圣祖著:《疏勒河流汉长城考察报告》,甘肃省文物局编,文物出版社,2001年。第9-10页,图板4-6,60。
- B. 甘肃省文物考古研究所,吴初骧著:《河西汉塞调查与研究》,文物出版社,2005年。第47-131页,图11。
- ⑰甘肃省文物考古研究所,吴初骧著:《河西汉塞调查与研究》,文物出版社,2005年。第16-17页。
- ⑱岳邦湖,钟圣祖著:《疏勒河流汉长城考察报告》,甘肃省文物局编,文物出版社,2001年。
- ⑲同⑳B。
- ㉑A. 普尔列:《南隔壁、前杭爱等省隔壁草原地区进行的考古调查(1962年)》,《X.普尔列院士学术论文集》T. I.,乌兰巴托,2001年,270-280页,第274-275页。
- B. БатсайханЗ. 巴图赛罕:《匈奴(考古学、人类学与历史)》乌兰巴托,2002年。第46-51页。
- ㉒同㉓A. 3. 巴图赛罕:《匈奴(考古学、人类学与历史)》,乌兰巴托,2002年。第46-51页。
- ㉔同㉕B。
- ㉖A. 盖山林,陆思贤:《内蒙古境内战国秦汉长城遗迹》,《内蒙古文物资料续辑》,1984年。90-100页,第98-99页,图3,4。
- B. 盖山林,陆思贤:《潮格旗朝鲁库伦汉代石城及其附近的长城》,《中国长城遗迹调查报告集》,1981年。25-33页,第26-28页,图2,4,5,6。
- ㉗㉘同㉙B。
- ㉚《中国历史地图集》,第二册,中国地图出版社,1983年。地图17-18。
- ㉛鲍桐:《受降城与满夷谷考》,《中国历史地理论丛》,1992年1期。191-200页,第195-197页。
- ㉜《中国历史地图集》,第四册,中国地图出版社,1983年。地图19-20,60。

特约责任编辑:陈永志